

中·国·近·代·人·物·文·集·丛·书

杨荫杭集

下

杨
绛
整理



中
华
书
局

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

杨荫杭集

(下)

杨绛整理



中华书局

过年谈

一

今人相问，辄曰：“汝家过阳历年乎，抑过新历年乎？”答此问者，大率旧派过旧历年，新派过新历年。但此所谓过年，非空言度过之谓，其意盖指祭祖报神，即古人所谓腊与腊耳。古伊耆氏始为腊，盖蛮人于岁终会猎，以所猎禽兽祭鬼神，颇类迎神赛会。故子贡观于腊，有“一国之人皆若狂，赐未知其乐”之说。后世所谓过年，即此相传之旧俗。故所谓过年者，苟不脱报神祭祖之俗，无论行之于旧历之年终，或新历之年终，其为旧法则一。旧法固不尽可非，然必于年终祭祖报神乃谓之过年，则亦可以不必。论神者其说不一，或言一神，或言多神，或言无神，今姑弗深论。但今世年终所祭之神，固非耶家之上帝，亦非儒家之先圣先贤，不过五路财神耳。此所谓神，近于魔鬼；此所谓祭，近于行贿。姑无论于迷信，其居心之猥鄙，已不可问矣。论鬼、论灵魂者，亦其说不一。范缜作《神灭论》谓形谢即神灭，阮瞻作《无鬼论》谓鬼服生人之衣，岂衣亦有鬼？此皆与通说不符，为各教所不容，今亦姑弗深论。但精灵终非躯壳，岂有荣养消化之机？若有荣养消化之机，则亦为血肉之体，不得谓之精灵矣。且鬼果能食，亦必朝饔夕飧，乃可以果腹，仅恃春祠秋尝，其槁饿固已久矣。况

祭馐之余，酒肉仍其原状，此即鬼不饮食之证。藉曰嗅其膻臭，可以当大嚼，则编户皆有庖厨，酒肉盈于市肆，可罄量而嗅，取之无尽，岂尚有若敖泉下之馁，庭坚不祀之哀乎？

二

或曰祭祖先，吾国教孝之一端，而倡废祀之说，或近于败俗。然教孝与祭祀无关。教孝尚实事不尚虚文。明知死者不能饮食，而强与之饮食，此同于儿戏，以此为孝则孝亦儿戏矣。不孝之子，或丰于自养而吝于养亲，然欲使之祭，彼固无所吝，以祭馐之酒食彼仍自赡之，未尝有所损也。自赡其实，而赡亲其名，以此为孝，则为孝虚伪矣。或谓祭祖先虽无益，然不害于善良风俗，则仍旧贯亦无不可。此犹楚王为穆生设醴，若并醴酒而不设，是意怠也。然吾谓孝子求所以不忘其亲者，亦多术矣，不必神道设教，执鬼犹求食之说，效巫覡之所为也。若言风俗，固亦未尝无所害。孟子言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此其意盖欲奖励人口之繁殖。然因此而好色荒淫之徒，皆以此为借口，遂使中华有蓄妾之恶俗，为世所诟病。且滥婚无度，其种弗强，皆祭祖先之说阶之厉也。祭祖先之说行，无子者乃必以他人之子为子，而遗产失其处分之自由，甚或亲女及孙女嫁而不齿于子孙之列，而素不相识之疏宗反得操戈而入室；于是狱讼滋繁，狙诈之风长，亦祭祖先之说阶之厉也。孔子不云乎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”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苟得此说而一以贯之，则儒家祭祀之礼可尽废也。

《申报》一九二二年一月五日、六日

国事与赌博

凡好赌博者，皆不可任以国事。或谓古之英雄，有起于博徒者，不可拘以小节。然古之英雄，亦有起于剧盗者，要不得谓剧盗可任以国事，剧盗当国，国事可知矣。博徒当国，国事更可知矣。

任国事者，第一须有财政上之道德，与财政上之信用，苟无此资格，即一事不可行。好赌博者，虽指誓天日，不侵占公家一钱，然一掷巨万，岂能保其必胜？铤而走险，急何能择。此其不可以任国事者一。

任国事者，必先对于国事有把握而后出，不能以国事为孤注。好赌博者，习于行险徼幸，若以赌博之法行之于政治，胜则捆载而行，败则鼠窜而去。以国事为赌博，徼幸于一试。其组织一次内阁，犹打一圈麻雀、推一场牌九耳，结局亦可想而知。此其不可以任国事者二。

有某哲学家谓赌博之所以不可行，在赌博者之心，皆欲损人以利己，旨哉斯言。故由赌博者当国，行其赌博之道，势必损民以利己，损国以利己。藉曰公私交利，人我交利，固非好赌者之心理也。此其不可以任国事者三。

《申报》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

新春秋

旧学家辄言三代之隆。其实所谓三代者，不过弱肉强食，大者王、小者侯之局。偶有强者，诸侯朝之，即谓之得天下；及其衰也，诸侯不朝，即谓之失天下。故不朝为最痛心之事。大射之礼即作不朝者之象而射之，谓之“射侯”，其怨毒可知。春秋之世，诸侯皆朝齐桓、晋文，儒者谓之霸。其实所谓禹、汤、文、武者，皆此类也。三千年后有民国，一朝复古，乃与此同。所异者，昔为朝，今为电贺；昔者防风氏后至，则执而戮之，今者洛阳贺电不至，则昏暮求之；向者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，犹有断之之仪，今但闻齐威王“咄嗟尔母婢”之恶声耳。故京津奔命，弊于河阳之狩；直奉交恶，烈于黄池之争；辽洛聚议，烦于衣裳之会。王人微，故不书；馀一人仅亦守府，溢之曰“赧”，敢不瞑乎？然则禹排洪水，周公驱猛兽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大一统，无义战。今之报，亦古之《春秋》也。

《申报》一九二二年一月七日

梁内阁之寿夭

盐馀借款成，梁内阁或可偷生一年。盐馀借款不成，梁内阁将坠地而殇。然下殇不失为善终；偷生之结果，必至于横死。横死之前，受绝大苦痛者，不独梁内阁。

梁内阁夭，奉直虽伏争机，或不至暴发；梁内阁寿，必酿成奉直之战。梁士诒世称高才，为民国之策士。昔者奉袁世凯为帝，或谓其受迫；然今日在张作霖卵翼之下，又谁迫之耶！张作霖事事摹仿袁世凯，实不如袁世凯远甚；犹之袁世凯事事摹仿曹操，实不如曹操远甚。袁取法乎曹，仅似袁术；张取法于袁，仅似张献忠耳，而奉为主人，虽苏秦、张仪，羞为之矣。

或谓盐馀借款成，梁可挟奉以制直。然因借款之故，即发生种种罪恶，以自削弱。有对内之交换条件，遂发生用人问题，而为众矢之的；有对外之交换条件，遂发生国权问题，又为众矢之的。梁内阁于是体无完肤矣。直派批亢捣虚，与之相见于中原，正未知鹿死谁手耳！

一言以蔽之，梁内阁者，直奉大战之导火线也。导火线不早扑灭，中华又从此多事矣。

《申报》一九二二年一月八日

寓 钱

《法苑珠林》谓纸钱始于殷长史。《封氏闻见记》谓古者享祀鬼神，有圭璧币帛，事毕则埋之。后代既宝钱货，遂以钱送死。《汉书》称盗发孝文园瘞钱是也。率易从简，更用纸钱。《天禄识馀》：“唐临《冥报录》云：‘纆纸为钱，以供鬼神，自唐以来始有之，谓之寓钱。’”今考正史，《唐书·王琬传》：“汉以来丧葬皆有瘞钱，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。琬乃用于祠祭。”《宋史》：“李用和少穷困，居京师，凿纸钱为业。”可知此风唐宋为盛。李长吉诗：“纸钱窸窣鸣旋风”，范成大诗：“乌啄纸钱风”，则见于诗歌矣。但在宋时，纸钱犹与瘞钱并用。南宋后始专用纸钱。近世出土古钱，北宋钱陈陈相因，而南宋钱罕，即其证也。尝谓最古蛮俗用人殉葬，其后仅用金玉财贿，最后变而为纸钱，不可谓非进步。然近世用锡箔，每岁所耗甚巨。西人尝统计其所耗之数，以为奇俗。且筑之挺之，切之磨之，榘榘然用力甚多，而付之灰烬；既暴殄天物，又空殫民力。此虽较愈于殉葬厚葬，要亦古之蛮风，不容于今日者也。

《申报》一九二二年一月九日

感应篇书后

今世所行善书，以《感应篇》为最古。钱牧斋《绛云楼书目》有宋板《太上感应篇》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及《道藏》，皆著录是书，盖晋时《抱朴子》所述道戒。考“感应”二字，始见于《汉书》。此书所言，亦多袭汉人旧说。郑康成注《礼记》“七祀”，谓小神居人之间，司察小过，即书中所谓司过之神也。汉赵壹《谢友人书》曰：“收之于斗极，还之于司命”，即书中“三台北斗”之说也。《淮南万毕术》曰：“神晦日归天白人罪”。即书中所谓上诣天曹，言人罪过也。顾此皆宗教家言。子产曰：“天道远，人道迩。”以人道之迩者言之，亦自有感应之理。忠恕为道不远；施之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人与人相偶，苟以己所弗欲者施之于人，人亦将以彼所弗欲者施之于我。故明乎忠恕之道，积善者自有馀庆，积不善者自有馀殃。所谓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而由道家言之，则谓之“感应”，由佛家言之，则谓之“因果”。

《申报》一九二二年一月十日

戒媚灶说

媚灶之说甚古，春秋时王孙贾已言之，远在李少君以祠灶方见汉武帝及阴子方以黄羊祀灶之前。特所以媚灶之故，王孙贾既佯为不知，而孔子亦但反对媚灶，以为“获罪于天”；其所以获罪，亦语焉不详。尝考祭法七祀，其七曰灶，郑康成注七祀，谓“小神居人之间，司察小过，作谴告者”。《淮南子·万毕术》曰：“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。”陆龟蒙《祀灶解》曰：“灶鬼以时录人功过，上白于天，常祀之以祈福祥。”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：“灶神名隗，又姓张名单，常以月晦日上天，白人罪状，大者夺纪，小者夺算，故为天帝督使。”观此知王孙贾所谓媚灶，犹今日官僚谄事上司之委员，遇有调查事件，或夤缘请托，或公然行贿，或饮食征逐，盛设供张或代为购置物货，务得其欢心，以期覆命时为之缓颊。此皆齷齪小人丧廉耻者之所为。故孔子以为“获罪于天”，言虽因献媚而幸免，仍为天之罪人，故曰“无所祷也”。果尔，则人苟襟怀磊落，俯仰无怍，灶鬼之功我、罪我，固听其自然，不必为之供旨酒，设粢盆，仆仆尔亟拜也。

《申报》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

兵谏与军用内阁

民国之有兵谏，盖作俑于袁世凯。袁自能弄兵，非受人兵谏者。然与国民党齟齬时，恒嗾使军人通电，电文结语动曰“枕戈以待”。其后相习成风。段祺瑞亦利用通电以吓议员，并利用兵谏以窘黎元洪；不料作法自毙，卒因吴佩孚之兵谏，而安福从此失败。吴佩孚狙于蒲骚，今日犹用故智；虽揭策外交问题，立论甚正，彼与安福同其腐败者，当然与安福一例消灭。然兵谏一之为甚，不戢亦将自焚。吾谓民国兵谏之风果不止，断送民国者，必兵谏也。

梁士诒果为卖国与否，及措置失当与否，今姑不论。即假定梁士诒为高才，而奉张作霖之命组织军用内阁，成绩亦可知。近日北京阁员，大率皆军人所推荐。试思畜犬苟不鸣吠，安用此犬？然则军用之犬，大不易为。无论张作霖之犬不易为，即曹锟、吴佩孚之犬，亦不易为也。军人以阁员名额为赃品，坐地而分。分之均，则苟安一时；分之不均，偏重甲则乙起而争，偏重乙甲又起而斗。长此循环，伊于胡底。吾谓民国军用内阁之制不废，断送民国者，必军用内阁也。

故梁阁恋栈，所以速乱；梁阁退，乱亦未艾。

《申报》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日

海军与博徒

北京之主持财政者，前为大殍客，今为大赌客，宜其信用扫地，受人之轻诬。此次内阁如果解散，其继殍客、赌客而起者，必大有人，以在军阀笼罩之中，非殍客、赌客之徒，亦不肯当此任也。

然近日海军之举动，不能谓之正当。陆军截留国税，久等于劫夺。此次海军开往十二圩，亦同于哗变。民国近事如此类者，皆足使中国财政沦于万劫不复之地。其对外丧失信用，亦犹以博徒长财政耳。

更可异者，乃以海军军人之名义，直接通电于外国公使；此尤见海军中知识程度之低。海军枵腹，诚不必与外人饶舌。然今日以国体名义，对使馆滥发通电，为外人所讪笑者，尚不一而足。海军之电，其尤著者也。

《申报》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

王八说

· 今世骂人曰王八，或谓始于五代。《五代史》王建据蜀，阻兵自雄，而少时无赖，以杀牛盗驴贩私盐为业，世人恶之，名曰“贼王八”。据此说，则所谓王八者，乃雄霸一方之武人也。或又谓王八之说始于金。《金史》有王八，与王毅共守东明，兵败被执，王八前跪将降，王毅以足踏之。故世称畏缩无耻者曰王八。据此说则所谓王八者，乃腆颜媚外之武人也。吾谓此二说者，当以后说为近。今北方人名龟曰“王八”，龟为畏缩不前之物。魏太武骂宋文帝曰：“龟鳖小竖，夫何能为？”此犹今人骂王八不中用耳。皮日休谒归仁绍不得见，乃作咏龟诗曰：“硬骨残形如几秋，尸骸终是不风流。顽皮死后钻须徧，只为平生不出头。”则龟之所以贱，正因其畏缩不出头耳。然考金时风俗，尚不以龟为讳。金宣宗诏赵秉文杨云翼作《龟鉴万年录》即其证。即降而至于元末，谢应芳犹自称“龟巢老人”。则知金元时犹以龟为美称。名龟曰王八，非言王八似龟，乃谓龟似王八耳。

《申报》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

博士谈

今世以博士为时髦。凡号称博士者，虽未见其人，要可想像其形貌：大率口衔雪茄，鼻架鬃鬃，须分八采，麴服燕尾，一手执杖，一手执手套者也。黄省曾《吴风录》谓张士诚时，走卒厮养皆授官爵，至今呼椎油作面佣夫皆为博士。陆容《菽园杂记》谓磨工称博士。此草率名分，明初有禁。然今日习俗相传，犹有油博士、酒博士、茶博士、汤博士诸称，非明法所能禁也。《封氏闻见记》载李季卿宣慰江南，时茶饮初盛行，陆鸿渐来见，衣野服，随茶具而入，既坐，乃手自烹茶，口通茶名，区分指点，季心鄙之，茶罢，命奴子取钱三十文，酬煎茶博士。此即今世茶博士之名所由起。然大地各国知饮茶之法为中国所发明；而中国人知饮茶之法，为陆鸿渐所发明，则陆鸿渐之于茶，固可以当博士之名而无愧。使今之称博士者，皆能如茶博士，固可以博士之名自豪矣。西文博士之称，与医士无别，故治齿者亦称博士。吾国习医者，得一二霉毒秘方亦自称博士，或以为僭。医称博士，不在欧化东渐以后。《旧唐书》开元十一年，命州县置医博士二人；则医称博士，由来已久。有油、酒、茶、汤即称博士，岂治齿治霉毒者独不能称博士乎？

《申报》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

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书后

此碑首言“三一妙身，无元真主阿罗诃”，国人于“阿罗诃”向未得其解。据近世欧洲学者之研究，则“阿罗诃”即叙里亚文之 Eloh，希伯来文谓之 Elohim，秦言上帝也。碑末书“大耀森文日建立”，“潜研堂跋尾”仅言“大耀森文”为彼教中语。据西人言，“耀森文”为波斯语 yosumband，即礼拜日也。读此碑知奈司托利安宗 Nestorian 在唐初已盛行于中国。自太宗后，历高、玄、肃、代、宪数代，相传不废。但《唐书·食货志》：“武宗毁佛寺，借僧民为民，其中有大秦穆护袄二千余人”，则大秦景教亦遭波及。然吾尝读《马哥博罗游记》，辄言某地有奈斯托利礼拜堂，书中屡见，不止一所。可知大秦景教，沿至元世祖时依然未废，但其形式已与僧寺无别，不为人所属目耳。《唐会要》载天宝四年诏书，谓：“波斯经教出自大秦。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，天下诸府郡县者亦准此。”可知波斯寺与大秦寺无别。唐以来所谓袄庙，或奉波斯拜火教。然拜火不必用袄字。《说文·新附》：“袄，胡神也，从示，天声”，其实“天”、“袄”古今字；《长笺》谓：“旁门大半事天为宝。”可知拜上帝之教谓之袄教。若波斯拜火教而亦谓之袄，乃由波斯与大秦相混，世俗不能区别。邹汉勋《读书偶识》谓：“《六书通》：‘关中谓天为袄’，《释名》：‘天，豫、并、兖、冀以舌腹言之，天、显也，在上高显也；

青、徐以舌头言之，天、坦也，坦然高而远也。’是‘天’字古有两音：其以舌头言之，而音近坦者，即《唐韵》之他前切也；其以舌腹言之，而音近显者，即祆字之火千切也，祆即显之平声。”邹氏此说尤足证明“天”、“祆”为古今字。唐人所谓“祆”，即今基督教徒所谓上帝。但祆字不始于唐，在晋时已见传记。杜预注《左传》有“睢人泗水次有祆神，皆社祠之”。意者犹太诸教在魏晋时已入中国，故有祆神。若波斯之拜火教，始于苏鲁支，虽亦甚古，未必不早传于中国，然既以拜火为教义，固无缘称“祆”。乃知晋时之祆神，必为拜上帝教，而由外国传入，故《说文·新附》曰“胡神也”。

《申报》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

卖 国

明宰相周延儒，当崇祯之世，朝野上下群指为卖国，好事者至演为《卖国传奇》，流布全国。其实当时周延儒对于满清，绝无收贿之确据，指为卖国固不无少过；但不卖国为一事，阉茸误国为又一事。周延儒之罪，固不因其不卖国而从末减。

宋宰相秦桧，当南宋议和之役，人皆指为卖国，几为定论矣。然熟读金、宋史，度以当时金、宋之情势，有谓秦桧虽恶，不得轻指为卖国者。平心论之，秦桧是否卖国尚有问题，但观秦桧在相时之妄作妄为，其人即非卖国，其罪亦与卖国等。

前总理段祺瑞当国，滥借外债，引用群小，斥为误国则有馀，斥为卖国尚不足。但在今日，妄思推戴段祺瑞，扬安福之死灰，此其引用误国之人之罪，亦与引用卖国之人之罪等。

自梁士诒为总理，人亦群指为卖国，记者尚未下此断语；但记者之意，则谓周延儒、秦桧不能作宰相，即段祺瑞、梁士诒不能作总理，而卖国不卖国之说不与焉。若因恋栈之故；暗行其纵横捭阖之术，流毒吾民，则梁士诒即非卖国，其罪亦与卖国等。

《申报》一九二二年二月五日